

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史学卷（上）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 学 卷

(上)

罗志田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 学 卷

(下)

罗志田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09-02675-4

I.2... II.罗... III.①社会科学-科学研究
-中国②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C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19 号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 (上下)

罗志田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9.25 印张 8 插页 68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9-02675-4

K·385 定价：49.00 元

出版说明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需要回顾和总结的东西的确很多。我们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目的就是试图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梳理、阐发和总结，希望能为下个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及社会问题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从提出选题到最终付梓，历时三年多。其间，召开了两次编写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汪晖、李培林、葛兆光、王守常、汪丁丁、孙立平、朱苏力、李强、贺卫方、高名潞、罗志田、韩毓海、黄平、王名贤等专家学者，以及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两次编写会议就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和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定八卷，包括人文科学四卷（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四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成书的只有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五卷。作为策划、组织者，总感到有些遗憾。

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都是活跃在当今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谢他们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合作，特别是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

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这也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

由于一百年来各门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也由于各卷作者的风格不尽一致，所以全书的体例并不强求统一，这反而使得各卷具有了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关心一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读者来说，将是一件颇有助益的事情。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编 序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 19 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也将推出“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专辑。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

在这套《学术与社会》丛书中史学占一卷，惟这样一本百年学术总结的大书，今日学有专长而比我更有资格和能力来“主编”的中年学者比比皆是。所以当山东出版总社和我联系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辞谢。我不欲接受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这又是一套限定时间交稿的书，全书已确定在 1999 年出版，各卷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将全稿送交出版社。就个人对学术的认知而言，我倾向于认为这样大的题目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限定的短时间里完成；从根本上言，所谓“完成”恐怕也不过是阶段性的结果而已。以前的人常说“盖棺论定”，今日媒体的口头禅是“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其实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未必有

彻底的终结，其后总有强弱不同的余波（事既未了，何来定论？所以我主张在研究历史时注重过程甚于“结果”）。学术研究的魅力之一就在其不确定性，这当然包括无法确切预知“完成”研究的时间。

过去史家写书著文，完稿后总要放些时候，以就正于同人朋友，或期立说者自身修业问学更有进境，然后修改定稿，庶几可以减少立说的偏颇。今日的学术氛围特别急功近利，学者多如陈寅恪所说不得已而“随顺世缘”，我也不例外，但内心对限时交稿总存几分不安。所以我曾向出版社提出数位我以为更远合适的人选，但他们均有更紧迫的任务，而这套书的最初策划者又有一些是很熟悉的朋友，后来终因不善于“说不”而勉强接下这一任务。不过，与国内目前许多人的观念不太一样，我理解的主编职责实际上只是个学术协调人（an academic coordinator），起一种居间联络的作用。这其实也非我之所长，但当时觉得尚可尽力而为（事实证明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此事做起来实在困难重重，“力不从心”的感觉真的是贯穿始终，换一个人一定做得更好）。

本来出版社给主编的任务包括写一篇综合性的引言，我也确曾写下一篇相当长的初稿，部分是预备有的作者无法按时交稿则用以滥竽充数，可喜的是后来一些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激发了写作的热情，虽然交稿的时间一再推迟，但实际写出的篇幅却已超过本卷原定的要求，自然也就没有刊印长篇引言的余地了；同时因多数作者都交稿甚晚，时间上也已没有细读各编后略作归纳的余地（我原认为引言或“编序”应对本卷内容有所交待，但前提是必须先看到全稿，结果未能入愿）；更主要是在拜读了各位作者的著述后，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认识和了解的确较前大大深入，但“知识增时转益疑”，知道的愈多，愈感到不知的还更多，反失去下笔的勇气了。好在本卷各编皆

有特色，作者的文笔亦佳，辞足达意，相信读者看过后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自有体会，所以我仅将怎样编辑本卷的一些设想和实际的做法稍作说明。

百年学术的总结实非易事，更不可能在限定的短时间里“完成”，故本卷的设想一开始就不求全面，如果能对 20 世纪史学的几个侧面作出相对深入的研究和批评性的探索，则于愿足矣。研究者的认识能力有限，其可据的材料也有限（20 世纪史料本来保存较多，但时间的限制大大制约了研究者掌握材料的范围），这种双重的有限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其实也相对有限。尤其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多歧性，新旧中西各种因素常常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并存，相互影响也相互制约，同时在许多方面又彼此互渗和重合覆盖。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似乎增添了历史的模糊感，也许历史本身就不那样黑白分明、界限清晰，或者历史现象本来就更多是杂而不纯的；说不定，历史的魅力正蕴涵在其朦胧之中。作为近代学术分科之一的史学自然也带有多歧而朦胧的特色，所以本卷的编辑宗旨是不求完整、不作定论。

我对自己的学力和治学范围尚有自知之明，故本卷的编辑原则是名副其实地“编”：主编虽也曾提出一些选题的构想，但各专题的取舍以宁缺勿滥为原则，相当一些原设计的专题目前或尚无人研究，或研究得不够充分，或未联系到学力足以完成该专题的学者，结果原设计的专题有好几个都取消了。各专题的具体内容则由“到位”的各作者依其专长而最后确定，其结构安排也全由作者自主（故本书的章节体例不甚一致）。交稿后主编不仅不搞所谓“通稿”，并尽可能不作文字改动（若改亦采取提出修改看法请原作者自己斟酌的方式）。希望编出一本各部分有其独特风格而又能融汇在一起的学术著作。

在这样的编辑原则下，本卷各专题的文风各异就是自然的

现象了。不仅文字，在撰写的取向上有的作者更偏于原始的研究，而另一些作者则偏于带综述性的总结。我是倾向于前者的，但后者也自有其功用和针对性。附带地说，各专题表述出的观点个人也未必全都同意，有些作者的一些具体看法与拙见恐怕还适相对立。^① 不过我以为这正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多元风貌。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的序里曾说：孔门之中，“师、商之论交，游、夏之论教，何曾归一？终不可谓此是而彼非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依今日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在知识产生和传布（distribution）的过程中一直有权力运作存在。“主编”大概也算多少掌握了一点“话语权势”，如果遵循“必欲出于一途”的取向而利用其“权势”使所编的书“统于一尊”，虽然读起来或更顺畅，却未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它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本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 20 世纪将结束时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

^① 如刘龙心小姐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学术或知识分类，我则以为过去虽有许多人确作此说，但他们多是较随意的表述，严格说来四部只是书籍的分类。从晚清起国人使用“学”字颇随意，今日更有所谓“红（楼梦）学”甚至“钱（钟书）学”等，但以我的孤陋寡闻，便未曾见有人说“集学”（就是“子学”或“诸子学”的说法似亦晚出）；昔人言治经、治史、治诸子者皆有，而言“治集”者便极少见（我实未见）。此意曾向刘小姐提出，然她认为有坚持的理由，故这样的论述仍存本卷。又如王晴佳先生在论及近一二十年的中国史学趋势时，颇引用一些口吐真言式的“史学议论”，我却以为这不仅不能代表“中国史学”的趋势，根本连引用的资格也没有。此意也向王先生述及，但他现在身处美国，希望对中国的史学“成果”尽量容纳和“承认”，所以也只能放弃拙见而保存他的看法。

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藉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前此史学的异同。除了一般史学史中较重视的史学思想之变迁外,也希望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如历史课本)、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institutions)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

全卷提倡多叙述少议论,但不回避对一些观念或研究取向的正负两面影响提出作者的学术判断,希望达到一种笃实而体现识力、有裁断的风格(即不作空论,也不仅仅排列史料)。要尽可能表现出各专题内容原本的特色,尽量从当时的思想学术环境及其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学术视角、思路、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而不是依靠“后见之明”对其下判断。比如,“古史辨”派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和冲击甚大,而今日对其认知颇有见仁见智之别,若不立足于当时,无意中便可能带出偏见。^①又如所谓“五朵金花”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核心课题,在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此已可见明显的观念转变,如果用后起的观念去处理1950年后二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便有可能失真;倒不如基本不考虑今日一些人的置疑,让其以本来面目出现,而将变化后的观念运用于讨论1978年以后这一阶段的内容。^②

20世纪中国学术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一定

① 关于“古史辨”的详细研究,参见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版;刘起钎:《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② 写此序时尚未读到蒋大椿先生关于近2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章,相信蒋先生的处理必更高明。

程度上仍在进行中)。本卷原希望有一专题讨论史学这一学科在本世纪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变,包括传统史学的延续与中断、新学术典范何时及怎样形成一个达到“约定俗成”(即得到学人共遵)程度的共识、此后史学学科的发展演化等。结果各专题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侧面论及这些内容,合全书而共观之,大致可得一个概貌,然专门深入的研究仍待来者。

史学的专科化是 20 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在各学科吸收与分化的长程中,史学几乎无所不在,而似乎也快失掉其本身的学科认同,渐呈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形象。1905 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依的类即西学分类,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日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了。这一分化的走向在整个世纪都在发展,到世纪末时仍呈增强的趋势。21 世纪的人或会问:是否存在不涉及其他学科也不分为子学科的“一般史学”或“总体史学”?如果存在,何在?若不存在,则什么是史学?

专科化的结果自然逐渐导致跨学科的史学。梁启超大概最早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对史学的辅助功能,至少是早期最为强调这一倾向者。此后提倡这一取径的史家不少,但成功运用者实不多;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是从 60 年代后期开始,而大陆则晚到 80 年代了。所以近年大陆史家仍在强调“跨学科的史学”(主要指史学需要各社

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支持)^①，而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如今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和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是史学界的“成熟”^②。

这里其实牵涉到史学的自主性甚至学科认同的根本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各相关社会科学的极大冲击，这导致从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不同（这些人关于史学不那么“客观”的言说其实正是基于对史学自主性的深刻关怀）。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本身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③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史学的专科化和跨学科的史学这两方面在本卷的第三编和第五编已较多涉及，而可以更深入探讨者仍很多。下个世纪的

① 我自己就是这些学人中的一个，不过我认为真正跨学科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训练，故主张不具备此类训练者不妨先尝试在史学范围内跨越各专科化的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等樊篱，以增强学者视野的开放性。参见罗志田《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2期。关于近年大陆学者的主张，参见本卷王晴佳先生的论述。

② 杜正胜：《史语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迈向新学术之路：学术史与法学的省思”研讨会，台北1998年10月，第19页。不过，在同一研讨会上，臧振华先生则提出“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考古学”，以区别于“历史取向的考古学”（参见其会议论文《中国考古学的传承和创新》，第19页）。

③ 参见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收其《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221页。

中国史学几乎可以肯定在专科分化和跨学科的路向上走得更远，而史学的自主性也必然引起更多学者特别是大陆学者的注意。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是近些年大陆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几年又较少），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这最能体现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学说时有意无意的选择性，这一选择性本身及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或许应是研究西学怎样影响中国史学所当进一步注意的问题。

本卷原设计有一个专题是“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位西方的学者来撰写。我原来的设想是将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发展演化，特别注重它与同时期西方社会、思想与主流学术研究的关系（比如受德国兰克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批评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希望写出其变与不变的两面。同时尽可能将经典的西方汉学（Sinology）与广义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之间的关联作些考察，如果还能涉及一些西方汉学对中国学者的具体影响就更好。为此曾联系过数位美国学者，并有学者代我在网上征求作者，惜皆未能成功。^①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在当地是相对边缘的学科，对其整体把握首先需要了解西方的主流史学进展；据我个人的孤陋见闻，目前尚乏这样的中国学者（只要看看我们各种“西方史学”的选本与欧美大学研究生“史学概论”课程的读物差距有多大即可知），因此这一专题只好放弃了。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本世纪初开始

^① 我想“限时交卷”这本身有些违背学术“规范”的做法恐怕是许多西方学者较难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除非正有这样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否则可能将所有相关文献读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其与此前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 20 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甚至出现了挖掘出“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提法（马衡语），惟因期望值过高也曾带来一度的失望，^①但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撑了 20 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 20 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考古学是否应该独立于历史学已成海峡两岸学人的共同关怀）。无论如何，考古学的总结应该是 20 世纪史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但我与考古界学人交往不多，了解既不足，选择面自然欠宽。曾请朋友代为敦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撰写有关考古学的部分，遗憾的是李先生已负担的任务实在太重，未能参与本卷的写作，这一专题仍不能不放弃。^②

本卷的最初设想原来还包括一个从研究取向和方法层面看学术典范的变与不变（兼及流派与代表论著）这样一个专题。这一点我自己其实是有所疑虑的。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

① 部分即因为“地下二十四史”长期未能出现，以至于专长考古的徐炳昶在 1940 年明确提出疑古的路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应“改走信古的路”，以在“传说”中“寻求古代略近的真实”。参见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6 年版，第 14～23 页。1940 年是徐先生署于其第一章“论信古”文后的撰写时间，比该书的实际出版时间早数年。

② 相关的研究可参看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4 期；傅振伦《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收入《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 1994 年版；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 年第 4 期；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关于考古学的第 4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5）》，三联书店 1997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即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也。但 20 世纪初清季学制改革时，已经半被“西化”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那时的课程设置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来胡适一生以言“方法”而著称于世，梁启超晚年还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皆未尝不受从清季开始的“方法热”这一语境的影响。但这一专题也终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撰者，不过本卷各编多少都涉及此类问题，而既存研究中涉及方法流派者亦多，可以参阅。^①

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与本套丛书的主题“学术与社会”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即史学与社会互动关系，在本卷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非常简略地讨论一下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与学术相关的新兴社会行为（比如出版发表）、史学表述方式的转变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如前所述，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本卷特别希望考察的部分。所谓学术建制是广义的，不仅指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而且包括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这些学术建制基本是 20 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

① 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第 2 编专论“近代史学方法”，均可参看；并请参阅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增订本；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1988 年版；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所幸本卷王汎森先生和刘龙心小姐那两编已部分论及，但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仍甚为宽广。^①

这些新兴学术建制与 20 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换言之，新环境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办学术机构最力恐怕也最成功的傅斯年指出：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②。其实，中国传统的中央官学（国子监、翰林院等）已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甚至相互竞争这一社会功能（如曾国藩即到北京进入翰林院后才认识到自己其实“无学”而发愤用功），可以解决“独学无侣则孤陋而寡闻”的缺陷。但正如留学欧洲的寄生虫学家洪式间所说：“各种研究所，均

① 这方面最新也最详细的研究是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史学丛书第 3 种（1999）。并请参阅陶英惠《国立北平研究院初探（1929 - 1949）》，《近代中国》（台北）第 16 期（1980 年 4 月）；张越《〈国学季刊〉述评》，《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 1 辑（1994 年 11 月）；史复洋《〈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新 1 期（1995 年 8 月）；查时杰《私立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初探（1919 - 1952）》，《台大历史学报》第 20 期（1996 年 11 月）；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98 年版。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 页。